



百年振强

1907 - 2007

卷三·赤道丰碑





编后话

为纪念坤甸振强学校建校一百周年，《百年振强》筹委会出版的《百年振强》特刊终于面世。特刊分《沧桑岁月》（卷一）、《八方同贺》（卷二）、《赤道丰碑》（卷三）、《卡江文苑》（卷四）、《盛典激情》（卷五）。

《沧桑岁月》汇集了振强学校建校一百周年的资料，见证了西加里曼丹华社的历史变迁。由于二战和60年代那场政治浩劫的破坏，学校被摧毁、教师员工失散、档案资料全部流失，我们只能凭校友手头保留的资料和回忆来编写。尽管如此，我们认为，《沧桑岁月》还不失为研究西加华社和华校历史的有参考价值的资料。《沧桑岁月》还选登了校友提供的有历史意义的照片和文章。

《八方同贺》刊登国内外校友、兄弟社团、工商企业家等祝贺振强学校建校一百周年的贺词贺联等。

《赤道丰碑》包括四个部分。其中“师恩不朽”刊登了校友对师长们的怀念文章；“群星璀璨”介绍事业有成、对社会做出贡献的校友事迹；“振强情结”汇集了校友对母校和老师、同学的怀旧文章；最后部分为“文萃论坛”，收集校友所撰写的学术论文等。

《卡江文苑》卷内有“翰墨飘香”和“丹青神韵”，汇集了校友近年来书法和中国画作品；“故乡风情”是以西加里曼丹风土人情为主题的摄影作品集；“文苑艺坛”则收集校友创作的文艺作品和歌曲等。

《盛典激情》以2007年11月举行的“振强学校建校一百周年庆典”为主要内容。汇集了雅加达联欢会盛况以及“回乡之旅”的珍贵照片；参加庆祝盛会的佳宾、校友的贺信、感言等。本卷以“因为曾经失去，重逢倍感珍惜”为主题思想，体现“百年振强”庆典“团结友爱、轻松活泼、欢乐和谐、激动人心”的浓烈气氛和情景。

《百年振强》编辑部自6月份成立至今不到半年时间，加上工作人员分散在印尼和中国各地，给编辑工作带来不少困难，《百年振强》特刊虽按计划出版了，但自感不尽人意，甚至还有差错之处，特向读者致歉。最后向《百年振强》特刊提供稿件和照片以及各种方式协助的校友表示衷心的感谢！

出版者：《百年振强》特刊筹委会

刊名题写：朱毅

总策划：许志

总编辑：黄新聪

编审：王广河

副总编辑：王兼发 胡炳兴 李翠萍 许映金 杨国豪

出版主任：郑光壮

编辑委员：郑银中 陈瑾辉 林文隆 吴榕秋 蔡剑声

鍾廷旭 黄勇聪 黄国亮 王千虎 刘乃文

赖景穆 杨烈明 林勤造 林世芳 林炳壮

封面设计：吴哲辉（黑龙江美术家协会副主席）

印刷厂：万年青广告制作社



目录

目录.....	(1-2)
---------	-------

师恩不朽

我的妈妈宋竹清.....	凌 彬.....(3-4)
一个教育家的心灵境界.....记许宜陶在日本占领时期逃难生活片断.....	许 宜 耀.....(5)
劳瘁宁为孺子牛.....回忆父亲方步樵老师.....	方 远 生.....(6-9)
一代青年导师的伟大形象——纪念方步樵老师逝世29周年.....	胡炳兴.....(10)
忆方步樵老师.....	陈浩凯.....(11)
我的堂伯游文华老师.....	游惜贞.....(12)
美术家的教务主任李昆峰.....	李雷骅、许 志.....(13)
忆廖文仲老师.....	黄新聪.....(14)
忆曾祥鹏老师点滴.....	胡炳兴.....(17)
深切悼念林长海.....	王兼发.....(18)
忆林长海老师.....	游惜贞.....(18)
难忘师生情.....	黄勇聪.....(19)

群星璀璨

朱毅的多彩人生.....	朱 毅.....(20)
追求真理 抗日救亡.....	朱 毅.....(21-22)
西加人的骄傲——彭嘉衡.....	编辑部.....(23)
李金松校友的强国梦.....	编辑部.....(24)
做淡泊名利的奉献者——记王文儒校友.....	编辑部.....(25)
振强精神激励一生.....	林可然.....(26-28)
我的西藏缘.....	周秋有.....(29-30)
艰苦创业，建设香港.....	蔡和平.....(31-32)
难忘的抉择，幸福的回忆.....	郭园君.....(33-34)
学如登山队 学无止境 ——凌彰的经历与写作简况.....	凌 彰.....(35)
骨科教授、著名手外科专家凌彤.....	凌 彤.....(36)
向母校汇报.....	凌 彬.....(37)
庆贺母校华诞，回顾个人历程.....	林晓慧.....(38)
为国争光的振强学子——泳坛老将林克纯.....	林克纯.....(39-40)
“集体家书”的主编王坚辉.....	阮志远.....(41-42)
为参加建设祖国南大门自豪.....	黄凯聪.....(43)
拼搏奋斗的人生.....	林勤造.....(44)
敢于挑战人生的刘乃文.....	王兼发.....(45)
王兼发在学术上的成就.....	刘乃文.....(45)
谈谈自己读书的经历.....	温开航.....(46)
无心插柳柳成荫.....	郑光壮.....(47)
我是如何走上写作道路的.....	李翠萍.....(48)
冰湖素描.....	袁 宽.....(48)
黄新聪——一位自学成才的校友.....	林 又 玲.....(49)
我们的血液流着振强基因.....	彭树森.....(50-51)
用学来的知识造福于人民.....	林少秋.....(52)
我这一辈子.....	郑序丰.....(53)
郭史云毕生献身教育事业.....	史国坤.....(54)
献身教育服务侨社 ——记振强校友王广河.....	韩 一 兵.....(55)
求学之路.....	王广河.....(56)
我与计算机结下不解之缘.....	黄勇聪.....(57)



振强情结

难忘的岁月——我在振强中小学执教四年的片断回忆	温广益	(58-61)
记忆中的振强	赖锡藩	(62)
难忘当年坤甸教学行	温梅娟	(62)
我的自述	卢戊清	(63-64)
永远的怀念	钟庭旭	(64)
我们这班人	黄新聪	(65-66)
粉笔生涯十年感怀	林长海	(67)
人生到处有青山——从笛子怀念黄锦城同学	赖景穆	(68)
振强精神不灭	林勤造	(69)
我的厦大情	刘乃文	(69)
振强校园生活改变我的人生	吴英华	(70)
忆母校点滴	谢惠兰	(71)
振强缘	林炳壮	(71)
我的母校	陈庆祥	(72)
振强精神指引我走上成功之路	黄汉权	(73)
怀念彭光谋同学	王广河	(74)
“黎明”与“振强”	黄新聪	(75-76)
我永远不要忘记《黎明报》	黎明祥	(77)
昔日报童今何在	黄勇聪	(78)
雅加达 坤甸振强校友会在前进		(79-80)

文萃论坛

西婆罗洲华侨血史一页——惨案调查总结报告	许行	(81-83)
从硬的人生谈到硬的教育	贯之	(84-87)
论许宜陶的教育思想	谢光	(88)
为周总理打前站	朱毅	(89-90)
解决双重国籍问题的新办法	朱毅	(90)
周总理情系民心	朱毅	(91-92)
圆满成功的亚非会议	朱毅	(93-96)
振强学校——时代的产儿	白聪贤	(97)
印尼华文教育的发展前景刍议	徐敬能	(98-99)
印尼华侨教育的兴衰与华文教育的沉浮	温广益	(100-104)
传播中华文化，表达华人心声——海外华人文坛述评	凌彰	(105-107)
唐诗在印尼的传播	凌彰	(108-109)
对断肢再植的几点认识	凌彰等	(110-111)
罗芳伯	温广益	(112-115)
学然后知不足	林长海	(116)
浅析《羊城晚报》的“国际专题连线”	黄新聪	(117-118)
化石——解码地球灭绝生物	林又玲	(119-120)
立体几何直观教学的几点做法	郭史云	(121-123)
从振强校歌谈起	杨国豪	(124)
校歌体现了兴学救民族的理念	胡炳兴	(124)
诗学理论之探讨	王兼发	(125)
再谈诗的格律与治“诗病”手法	王兼发	(126-127)
如何正确看待与学习格律诗词	王兼发	(127)

我的妈妈宋竹清

凌彬



宋竹清（1902年—1944年）
1902年12月生于坤甸。
1927年夏毕业于上海大同大学，后来任坤甸德育女学校校长，兼任坤甸振强中小学教师。1944年惨遭日寇杀害。此照片摄于大同大学读书时。

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缅怀为国捐躯的英烈，学习他们的崇高品德，同时也想起了亲爱的妈妈宋竹清（印尼坤甸市德育女学校校长、振强中小学教师），她在日寇发动太平洋战争侵占坤甸期间惨遭杀害。60多年过去了，妈妈慈祥的音容笑貌依然时常浮现在脑海，亲人无辜被害的血海深仇，将永远铭刻在记忆里。

宋竹清，原籍广东梅县，1902年12月21日生于坤甸一个普通华侨家庭。在她4岁的时候，外公宋奇山在一次车祸中不幸身亡，留下年轻的外婆邓政秋和年幼的妈妈宋竹清、舅舅宋和衷，母子三人在艰难中度日。虽然家境贫寒，外婆依靠缝、补衣服等劳动所得，抚养孩子并供他们上学。妈妈自幼聪敏好学，成绩优秀，深得老师们的喜爱。1918年，一位早年来坤甸宣传辛亥革命并从事华侨教育工作的上海女教师，在回国前征得外婆的同意，将妈妈带回到苏州东吴大学附中继续读书。随后，妈妈于1923年毕业于南京第一女子师范，1927年毕业于上海大同大学英语系。一个童年丧父、家境贫困的女孩子，在罗叔章老师的引导和帮助下，长辈亲戚邓佛娇、邓玉秋资助下，得以有机会远渡重洋回国深造，加上自己一贯刻苦努力，终于成了上海知名大学的毕业生，这在当时实属不易。在妈妈艰辛成长的历程中，不断地积累了敬仰老师、长辈和热爱祖国的深厚感情。1929年，她回到坤甸，担任德育女学校校长。1935年，全家回到杭州定居。1936年发生“西安事变”后，她得知红军北上抗日和中国共产党发出建立抗日

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内心极为激动，从此开阔了眼界，更加关心祖国的命运。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为躲避日本鬼子的魔爪，举家辗转逃难，先后途经南京、武汉、长沙、广州、九龙等地，最后被迫再度出国，年底回到第二故乡坤甸。妈妈再度担任德育女学校校长，并兼任坤甸中华妇女会会长。

二战期间，许多华侨青年拿起武器抗击日寇或奔赴前线英勇杀敌，以及全球华侨为支援祖国抗战而举办的各项活动，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一个组成部分。抗日战争爆发后，东南亚各国的爱国华侨社团为支援祖国抗战，纷纷开展多种形式的宣传、义演和募捐。坤甸市也不例外，妈妈经常和学校教师、妇女会会员一起，为开展活动而到处奔走，有几次因疲劳过度而晕倒，但她义无反顾地坚持下去。据1947年3月8日坤甸《黎明报》刊登的《纪念故德育女学校校长宋竹清女士》一文介绍，为了支援祖国抗战，为伤兵、难民进行慈善捐款，妈妈当时组织了妇女服务团，被推举为团长，凡推销义券、剧场招待以及纪念节日卖花义捐等工作，该团均热心参加。南洋群岛各地华侨捐助祖国义款成绩中，坤甸得以名列第三，该服务团功不可没。妈妈在坤甸侨胞中有较高威望，许多人敬佩她踏实的工作作风、对师生们的热情关爱和赤诚坚定的爱国心。



1932年5月与长子凌彬、次子凌彬摄于坤甸。



1938年6月与幼儿凌彬（一周岁）摄于坤甸。

1941年12月8日，日本的海、空军突然袭击珍珠港，开始发动太平洋侵略战争。日军先后占领了东南亚。坤甸华侨素有爱国传统，曾不遗余力地支援辛亥革命和祖国抗战，因而倍受日本侵略者的忌恨。1941年12月19日，日军9架飞机对坤甸市区进行了狂妄滥炸，造成平民死伤2000余人，其中95%是华人。不久，日军占领了婆罗洲（今称加里曼丹）。此时，我4岁多，跟外婆、妈妈住在一起；大哥凌彬13岁，住在邦加岛亲戚家；二哥凌彬10岁，住在坤甸远郊的淡巴央港亲戚家。据有关资料，日寇占领西婆罗洲3年8个月中，先后3次大规模逮捕华印（尼）人士约3000余人，其中华侨约1500余人。

日军占领坤甸后，华侨学校被封闭。妈妈不畏敌人的威胁，拒绝与敌伪合作，保持了民族气节



与尊严。根据需求，妈妈在家里开了补习班，为亲戚和左邻右舍的孩子们讲授中文、算术等课程。由于想学习中文而参加补习的学生不断增加，就分为上下午两个班上课。妈妈热爱祖国和热心华侨教育事业的行动，使她同许多爱国侨胞一起，成了汉奸、日寇黑名单的人物。据1947年3月8日《黎明报》文章所述，1944年3月25日，妈妈被特警冈田等日寇逮捕，同年6月英勇就义，终年42岁。当时我还年幼，却清楚地记得，有一天早上，妈妈带我在厨房里淘米、洗菜，准备做午饭。突然听见附近有人高喊“日本兵来抓人了”。过了片刻，3个日本鬼子闯进我们家，翻箱倒柜，搜拿照片、信件和纪念品，摔碎许多茶杯和盘碗，这时妈妈预感自己可能被捕，便让我立即从后门逃往亲戚家躲起来。接着，她被日本鬼押走了。在途经附近的咖啡店时，妈妈寻机请店主阿婶转告外婆：“孩子们长大后，一定要回唐山(祖国)去!”外婆上街买鱼、肉回来后，看到家里一片凌乱、凄凉的景象，发现她心爱的女儿不在了，听了邻居们悲愤的诉说，她哭成泪人，几次痛苦地昏迷过去。此后，外婆和我每天都盼望妈妈回家来。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之后，家属们抱着殷切和强烈的心情，等待亲人平安归来。但是，这一朴素的愿望却残酷地破灭了!事实上，除了部分被捕者在狱中被审讯拷打致死或病死外，绝大部分人已被活埋在坤甸郊区的榴连港机场和东万律机场。盟军接管坤甸后一段时间，外婆带我同许多坤甸被难家属一起乘车前往东万律机场，目睹了无数惨绝人寰的埋人坑，以及从坑里挖掘出来的头盖骨、四肢等尸骨，大家无不泪如雨下，悲痛万分，同时在现场对死难亲人进行了祭悼。后来，为纪念死难的华印(尼)抗日人士和爱国者，控诉日寇的暴行，各地中华总会筹款在坤甸、山口洋、邦戛和东万律分别建造了“被难华印人士纪念碑”。被难家属和亲友们纷纷在纪念碑旁留影，寄托对亲人的怀念和哀思。

据大哥凌彰回忆，二战结束后他从邦加岛回到坤甸。1946年到1947年间，他作为旁听者之一，见证了驻守坤甸盟军的军事法庭判处山本、宫岛和伊东等十几名日本战犯以及汉奸林木盛等人死刑，后执行枪决。

在日寇侵占印尼期间，我们家惨遭杀害的亲戚还有：坤甸的黎钦祥(妈妈的表舅)、黎国华(妈妈的表弟)、李伟杰(妈妈的表妹夫)，邦加岛的凌瑞铨(我的叔叔)；我在坤甸振强中学读书时同班同学郭圆君的父亲郭克继和祖父郭两捷(及其两个兄弟郭两枝、郭两宝)，同学林晓慧的父亲林翼如，同学邓俊峰的父亲邓克尧也被日寇杀害了。他们都是热爱祖国、有正义感的海外赤子。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许多被日寇杀害侨胞的子女克服了种种困难，激情满怀地回到祖国深造，并投身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据统计，目前在北京的西加里曼丹侨友会成员有120余人，其中30多人的亲人遭日寇杀害。如今，他们大都已是60岁以上的老人，从几十年亲身经历中深切体会到：浪迹天涯的广大海外侨胞，身在异乡，情系故土，衷心祈盼着祖国日益强盛；有了强大的祖国作后盾，海外侨胞的正当权益才能得到保障。

抗日英烈为祖国和人民的安危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的爱国精神和崇高品德永远活在亿万人民心中，与天地共存，与日月同辉。让我们牢记这刻骨铭心的血泪史，悼念死难亲人，化悲痛为力量，共同为祖国的腾飞崛起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

(2005年于北京)



坤甸德育女校部分师生合影(1940年4月4日)后排左起第一人宋竹清校长，前排(蹲下者)左起第一人是宋校长之幼子凌彬。



宋竹清校长(左一)与老师们并肩漫步在林荫道上。



一个教育家的心灵境界

记许宜陶在日本占领时期避难生活片断

许宜耀

卡布亚斯江畔蓝色的晴空暗淡了；赤道塔上空的白云飘散了。刚经过了日机的疯狂轰炸，坤甸市像一座死城，各家门户紧锁，大街小巷静悄悄。振强学校大门紧闭，大门口台阶下横躺着一辆自行车，学校深处的一个小房间里，一位中年人对着另一位佩戴深度近视眼镜的中年人说：“季刚兄你随林先生先离开吧！”孙季刚校长还来不及回话，来了一位年纪稍大的壮汉，开口说：“宜陶兄，我来接你了。”许宜陶对着来者说：立科叔你来了。许立科转过身来对孙校长和林先生说：“形势紧张，先让两位老师分开躲起来好。我们那里椰山内，还很安全的。”

一艘“淡邦”（小渡船）载着两位老师、一辆自行车过了江，这时天色已近黄昏。许宜陶背着一个包袱，裹着两件换洗衣服和小件用品，坐在自行车后座架上，他们披星戴月赶路了。到了喃吧哇的圆山已近夜半时分。

圆山这个僻静的椰园小村落，这晚格外的热闹，一座“亚答”大屋和一座盐柴瓦顶木屋，煤油灯火大放光明，全家老少都在等待欢迎我们的同乡亲人。许宜陶走到老奶奶跟前说：“老婶，来‘搅混’了。”（即潮语添麻烦了）老奶奶说：“哪里，哪里，请都请不来哦。”我们族中一位长者走过来说道：“锣锤兄（许宜陶在乡间的乳名），就像到家一样。椰园内清静，你就好好休息。”许宜陶回答说：“风赫叔，多谢大家相惜。”大家都亲切地称呼他宜陶兄，并嘱咐他早点休息。

几十公里崎岖路程的劳顿，许宜陶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怎么也不能入睡。这位中年的教育家在想什么呢？屋后鸡笼里的雄鸡打鸣了。他起了床，沿着屋后的羊肠小路走着。清新的空气，茂密椰树叶的缝隙中，露出朝阳的艳丽红光。多么的寂静，也充满着无限的生气。他来到西婆罗洲时日不长，还未曾领略过此地乡间风光。

在屋后的水塘洗过澡之后，他回房端坐着，慢慢地喝了一杯白开水。他在沉思着。树人，树人，如何开始。这就是他的心思、愿望、理想。

在通往山口洋的公路上，宜陶兄歪歪扭扭地骑着刚学会的自行车，我们兄弟几人在立科伯父带领下，伴随宜陶兄去到山口洋。他不游波亭山也不逛街，一股脑钻进书店，语文、数学、英文课本选了一大堆；巴金的《家》、《春》、《秋》；亚米契斯的《爱的教育》等，又是一大堆。书，由书局店员送到旅馆。

不久，宜陶兄的卧房成了课堂。每天授四个班级的课。三人是一个班级，另三个班级是单独一个人。我就是单独一人的班级。宜陶兄每天早饭后便开始一个班级一个班级地授课，未轮到上课者就坐在一旁自习。课程有语文、英文和数学。我的语文课除了白话文的课本，还背诵一些简易的文言文，如“苛政猛于虎”等，至于数学，我从四则题开始学到代数。

在宜陶兄三年八个月的严格教导下，我从小学四年级到1945年轻松地考进“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初中二年级班，并且代数取得了优异成绩。

当年，我们除了上课读书，宜陶兄还带领我们自己动手修建了一个羽毛球场。我们打羽毛球：清晨还在球场上跑步。宜陶兄还带领我们到深山新开的土地种植稻谷。

有一些朋友常到圆山来探望宜陶兄，如被称为“老三爷”的林德明。他经常给我们带来一些“禁书”，如瞿秋白的文集。我年幼，这些书还啃不动，但他带来的蒋光慈《少年漂泊者》，却是我十分喜爱的，我读过一遍又一遍。来访的人中还有贝震寰。这些当年的青壮年和我的父亲许雄伟经过酝酿，组织了“西婆罗洲反日同盟会”，他们常聚集在宜陶兄的卧房讨论抗日的事，宜陶兄为他们出谋划策，成了他们的“军师”。

1945年8月中旬的一天，立科伯父带回了日本投降的传单。父亲、宜陶兄和我们都兴奋不已。

在暗淡的月光底下，两辆自行车，立科伯父、宜陶兄和我三个人上路了。我们轮流载着宜陶兄，晨曦时分到达坤甸瓜哇，住进一幢独立的小木屋。第二天清早，立科伯父进城探风声，同时迎来了孙季刚校长。两位教育家又相见在卡布亚斯江畔了。

“锣锤”、“锣锤”，宜陶兄正是一把硬骨头，他不怕诅咒，不怕威胁，不怕坐牢，他敲出的锣声告诉人们，天亮了；他敲出了社会的友爱、和谐；敲出了兴学树人的锣声，整个西婆罗洲“中华公学”像雨后春笋，像满山遍野盛开的杜鹃花。

这就是教育家的心灵境界。



劳瘁宁为孺子牛

回忆父亲方步樵老师

方远生



1951年摄于坤甸。

他朝着他的学生缓缓走来。瘦长的个子，有点驼背。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射出锐利的光芒，高高隆起的鼻子给人清高的感觉，嘴角有一丝刚毅透露出来。他走进课堂，一声“起立！坐下”后，即刻转身在黑板上唰唰唰一连写下“药！药！药”三个大字，然后说：“这是一剂反封建专制的猛药！这是一剂拯救愚昧灵魂的苦药！这是一剂救国救民的良药！今天，我们上的课文是鲁迅先生的《药》。”于是，全课堂鸦雀无声，只有他那抑扬顿挫的福建口音在响着。上世纪50年代，一个高年级学生，曾经向我描述他的语文老师讲课的情景。这个老师，就是方步樵老师，我的父亲。

父亲已经去世29年。今年，印尼振强学校的校友会要纪念母校诞辰一百周年，嘱我写一点文字纪念。当尘封了如此之久的记忆慢慢打开时，我的感情确实有点沉重。“子欲养，亲不在”啊，我无法报答他在我身上倾注的心血和扶养之恩。

父亲一辈子教书。1932年他24岁就开始在福建省莆田县小学教书；大概是1933年南渡马来亚，在实兆远华侨公立中正学校一干就是十几年（除日本南侵那段时间学校停办外）。他是那间学校第三十八届校长。1987年，作为中国新闻报社的记者，我到马来西亚吉隆坡采访汤姆斯杯羽毛球大赛，曾专程驱车前往该校，发现那里的华文小学依然兴旺发达，值得庆贺。该校礼堂上镶嵌着一块黑色大理石，上面刻着历届校长名字。父亲的名字赫然可见，这使我感动欣慰。1949年父亲在印尼坤甸振强中学当过教务主任；1953年在三宝瓏中华中小学当教务长；1957年在雅加达巴中、新中、华中教过高中语文，同时是兴安中小学校长。1965年9月30日前，当上最后一届椰华总会教育部长。综观其一生，为人师表，桃李满天下。大家都公认他是出色的教师，出色的华侨教育工作者，一个人品道德文章都令人钦佩的长者。

我们在“振强”度过了4年。那时我才10岁。我们住在一条桥和二条桥中间一栋“吊脚楼”里。坤甸这地方地势低洼，江河横溢，卡江一涨潮，就要水漫居民的墙基屋角。家家都把住房用木柱托高。振强学校的教室也不例外。记得调皮的学生在地板上挖一个小洞，常常边上课边垂钓，往往能钓到乌鳢，也就是国内叫做生鱼的那种。这个阶段，我们生活贫困，家徒四壁，父亲的工资不够家用，母亲被迫帮人洗衣，赚点小钱。

父亲教书，讲课生动，极富吸引力。他在家批改作业则一丝不苟。晚上，我和他同一书桌共一盏灯，我温书，他批改作业，各得其乐。但他往往会把同学写得好的作文介绍给我看，并告诉我好在哪里，这其中记得就有黄新聪同学的。1950年黄新聪回国，父亲认为他是可造就之材，还特意给在北京工作的外甥郭方（早年参加革命，当时在中央人民政府财经委员会工作）写了信，要他照顾好这个得意门生。郭方随即来信，欢迎黄新聪到北京找他，可惜黄因回国行程变动而滞留广州，两人失之交臂。至今黄新聪回忆起这件事，犹感“师生之情”的温暖。

后来我们离开“吊脚楼”搬到市里的广肇会馆住。这里是市区，“振强”一些学生毕业后还到父亲这里上夜课，大概有十个八个。父亲教的是古典文学。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上夜课要点气灯照明。这灯，就是我把气点亮的。

20世纪50年代的印尼华校，高中语文课本与国内同步。为了教好书，也为了给年轻的教师做示范，父亲根据语文课本写了不少教案。其中有《曹刿论战》、《背影》、《为了忘却的纪念》、《纪念刘和珍君》等等。父亲擅长古典文学，他对文言语法、文言虚词都有研究，学生们说“学文言最难的是这两关，向方老师学文言文显得容易”。他的教案曾被印尼华文大报《生活报》发表过，引起过国内有关部门的关注。



1932年在福建莆田小学教书时的教员登记证。

父亲在印尼还是著名的诗人。他在课堂对学生说过：
中国汉语言文之美就体现在文言文之中，他写了许多旧体诗，
其中《欢呼国庆十周年》写道：

翠微点点碧天秋，紫陌无尘车马稠；
十里云霞开胜地，万方岳岳动神州；
人潮旗海阵容盛，锦簇花团眼底收，
遥想怀仁堂上客，绮筵济济尽英流。

父亲也写白话诗，留下唯一的一首《无题》是这样的：

(一)

少年浪迹沪滨，
反覆低吟：
“海上秋风起了，吹薄了游子的衣襟！”

(二)

中年遍地抗日狼烽，
橡林怒火燃烧了，
举起沙盖族的投枪，
攀上他念他翁的高峰！

(三)

如今晚年的旅客，
历尽了蕉风椰雨的洗礼，
骑着骏马，迎着满天彩霞，引吭高歌：
“春风化雨被南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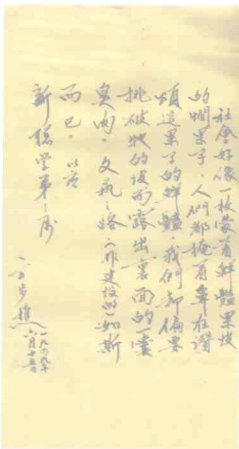
这首诗是上世纪50年代中在印尼三宝瓏时期的作品，发表后即被香港的文学刊物选入印华诗选中。应该说，这首诗因年代久远，我仅凭记忆抄录出来，难免有讹漏之处。诗中的“沙盖族”，指的是马来西亚少数民族，“他念他翁”是该国一处山峰。
父亲的诗给他的学生留下深刻印象的是那首七律自况诗：

反乌输乳几经秋，劳瘁宁为孺子牛。
赢得嶙峋傲骨在，春风化雨被南洲。

在他逝世25周年之后，在雅加达，有一批已经步入老年的华人，为了传承中华传统文化，组织了一个中国古文学习班，他们就是父亲当年的学生。那一年，为了纪念父亲，他们开了纪念会，把上述七律自况诗谱写成歌曲，在纪念会上反复吟唱。我今年已经68岁了，每当读史读诗读词，碰上艰深之处，就会想起父亲，如果他还在，学习的难题一定可以迎刃而解。而同时，眼前就会闪现他给学生授课的情景：耳边就会响起他那铿锵的吟诗声。呜呼，人生一世，能被后人如此怀念，如此爱戴，他也不枉此一生了。

在“振强”，有一件事我至今记忆犹新。那是1949年9月30日，大约在中午休课时分，我在学校的布告栏发现贴着一张新布告，用毛笔写着一行字：“明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全校放假一天”。下署教务主任方步樵。那时，坤甸还驻有中华民国的领事馆，附近三口洋南华中学校长曾祥鹏（即曾星辉）在“十一”升五星旗遭荷印军人枪击。后来父亲和曾星辉校长并肩战斗在华侨教育工作岗位上。他们是很要好的战友。直到后来，他们两人都移居雅加达，彼此依然过从甚密。在雅加达期间，父亲的朋友有：张国基、司徒赞、梁披云、刘耀曾、陈新华等。他们都是印尼华侨社会的翘楚。

父亲一生追求进步。他是福建省莆田县人，1926年18岁毕业于福建省立第十中学，也就是莆田中学，后来到上海大夏大学就读。他亲口对我说：这是一所进步学校。他在上海大量接触鲁迅、郁



方步樵老师为学生黄新聪赠言留念。



方步樵老师1975年在吉隆坡女儿家中拍的照片

经商脱贫。但父亲始终醉心于从事教育人的工作。我想这是他的信念使然。他希望他的学生、他的儿女能为国家做贡献。在遗嘱中，他把他的信念明确地表达了出来。

今天重读父亲遗教，我要为“均能多才而智，而勿多财而愚”这两句话喝彩！想想当今社会，暴富心理高涨，一些人为后代谋利不惜采用卑鄙手段乃至走上犯罪道路。这两句话应该掷地有声。

父亲虽然没有遗产，但临终却又有义举。事情是这样的：父亲在同乡中深孚人望，料到自己逝世后同乡们为了表达敬意会有所表示，他便早为之谋，在遗嘱中写道：“……或有厚赐，除医药等费用外，悉数拨充五脚桥兴安诊所为基金。”这兴安诊所是一间为资助贫病同乡所办的公益性医疗单位，一直依靠同乡的捐助苦苦支撑。父亲深知创办之不易和艰难。父亲的同乡挚友郑金钊、蔡文煊、陈琴棋三位先生后来在给我的来信中这么评价父亲这一举动，他们说：“从社会中来，也从社会中去，这是您父亲值得社会人士敬仰的一点”。小时，父亲教我读《出师表》，要学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啊，我明白，就是这个意思了！就是这个意思了！

1965年9月30日后，父亲和母亲被逐出校门，只能栖身于福建莆田同乡会的祠堂（又叫广化寺）里。在祠堂，父亲渡过了他人生的最后13年。母亲1976年先于父亲走了，父亲写信说，他同和尚一块吃（饭），感到“悲苦”。在这之前他还写过“我两目都生白膜，写字很苦”；还希望我们能“生四个（孩子）后再节育”，并说“这不是笑话，因为我俩今天身边没有一个孩子，孤苦伶仃，十分辛苦”。如果说父亲有什么悲哀的话，这就是他老人家晚年最大的悲哀，也是我这个不孝子的最大遗憾！

父亲住进祠堂后甚少写诗，这里录下的是他最后的几首，从中可以窥见他晚年的心境。

1973年，他写了两首：

- 其一 开春谁念瘦维摩，不俗不僧奈若何。
香赞曲从邻寺度，梵音正自隔庵过。
背依地藏藏千里，身住义祠孤孽多。
直待鸡鸣天下白，为君起颂阿弥陀。
- 其二 弥陀念罢懒重温，遣兴惟凭酒一樽。
师表漫夸垂万世，离骚几见赋招魂。
忧时历尽沧桑劫，嫉俗偏留花月痕。
相看喑痴非释子，只应怒目镇山门。

（相看即看相，意即犯戒——原注）

1974年中秋，写了一首给我“借留鸿爪”的：

不为时乖不为穷，只愁骨肉睽违中，
月光如水秋如梦，渺渺离怀又几重？



方步樵老师上个世纪60年代初期在雅加达兴安会馆前拍的照片。

父亲是1978年8月14日晚11时55分病逝于雅加达新明会医院的。等到我在国内获悉噩耗时，已经是9月初了。后来，从父亲学生拍摄的公祭葬礼照片看，还简单隆重和堪称生荣死哀的。父亲的骨灰和母亲的骨灰最终都扬播于大海中。我想他们一定是想托附大海波浪把他们的亡灵带回祖国的。现在过去29年了，他们的亡灵一定早已和他们儿孙们在国内一起愉快地生活着！ 2007年6月26日于广州



方远生，福建省莆田县人，1939年8月出生与马来亚实兆远，曾先后在实兆远华侨公立中正小学、印尼坤甸振强中小学、三宝壟中华中小学念书，高中毕业后在雅加达兴安中小学、新文中学教书。

1960年返国就读于广州暨南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1964年毕业后，在广州《羊城晚报》当记者。其后下放干校。

1979年至1997年退休前，在中国新闻社工作，曾分别担任过该社广东分社社长、澳大利亚分社首席记者等职。方远生还担任过广东省省侨联理事、广东省记协常务理事、全国记协理事。

一代青年导师的伟大形象

纪念方步樵老师逝世29周年

胡炳兴

大约15年前，以林浮萍为首的古文班同学曾经开过追悼会纪念方步樵老师逝世十五周年，参加当年追悼会的老师同学相当踊跃，在依稀的记忆中最少也有一百多人，这在当时的环境气候下算是很热闹了。作为一位教育工作者，离世十多年后还有人开追悼会纪念他，这该是一件很荣耀的事啊！今年是方步樵老师逝世29周年，振强校友会以《振强园地》全版发表了方远生校友（方老师的儿子）写的《回忆父亲方步樵老师》，以资纪念。

1949年方步樵老师曾在坤甸振强中学部任教并担任教务主任，在这之前他曾任教于马来西亚某华侨公立中正学校历时16年之久，期间也担任过该校的校长。而在坤甸因水土不服在振强工作了4年后，于1953年又赴三宝垄中华小学任教和任教务长。

1957年后定居雅加达，出任兴安中小学校校长，并担任过“巴城中学”和“中华中学”等校的高中语文课；方老师对古典文学专心致志、情有独钟，在椰城等地开办过古文班，鼓励青年学习古文。1963年被聘请为“侨总”主办的师范班古文讲师。直到华校被关闭，方老师在教育界已工作了三十多年。

方老师生于1908年，原福建莆田人，18岁在家乡中学毕业后就到上海一间进步学校攻读大学。上海自1919年“五四运动”后学生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风起云涌，这时在上海学习的方老师也受到很大的熏陶，首先他有机会接触到新文化旗手的鲁迅先生，他曾经去听鲁迅先生演讲（方老师在上古文课自述），而且也大量接触到许多进步作家的作品。方老师大学毕业后就选择了从事教育人的工作，这就是他的人生信念。在往后教学中，我们不难发觉到他的人生受一代导师鲁迅先生的影响是至深的。首先他向学生大量介绍鲁迅先生的作品，他认为鲁迅的作品是救国救民的“一剂良药”，作为青年学生一定要多读鲁迅的作品，并且要学习鲁迅先生的爱国思想和奋斗精神。凡是在方老师门下聆听受益的子弟，凡是经过他言传身教的学生，都会深深感受到方老师不愧是一位传承了鲁迅精神的好导师。

“诲人不倦、学而不厌”这也是方老师最可宝贵的精神之一。方老师心知肚明从事文教工作者，到头来两袖清风，一无所有，但他无怨无悔。五十年代我在振强母校念初中时，方老师上过我们的课；到1963年我远赴雅加达参加师范班进修时，方老师出任师范班的古文课讲师，于是我第二次在方老师门下聆听教益，他那些铿锵有力、抑扬顿挫的授课课调和对古典文学独树一帜的诠释至今仍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方老师从1933年就开始投身教育工作，屈指一算就是30年。他在讲台上一站就是三十年，三十年犹如一日，一“反刍输乳几经秋，劳瘁宁为孺子牛”。

为了人类的春天，日日夜夜，呕心沥血；倾心耕耘，永不停歇！这是何等崇高的教育工作者的形象啊！方老师的一生不但为教育界树立了光辉的典范，而他一生俭朴的教学生涯也给我们留下很深的印象。记得当年他在坤甸时是住在了一间很简陋的“吊脚楼”，不久后才搬入“广肇会馆”住。后来他定居椰城的十年间也是住在兴安学校的宿舍。学校被关闭后他栖身于椰城莆田同乡会的祠堂广化寺的一间厢房（这其实是一间神庙）时达十三年之久。据说方老师有亲朋好友要为他购置房子使他晚年有舒适的住所，但都被方老师拒绝了，方老师虽然一无所有，但“赢得嶙峋傲骨存”。

我于1975年到雅加达谋生，曾多次去拜谒方老师，并曾烦劳方老师介绍工作，某时他已“身住义祠孤孽多”，病魔缠身，讲话时上气不接下气。何况是当师母于1976年去世后显得更“孤苦伶仃”，但方老师却感叹地说，“不为时乖不为穷，只愁骨肉睽违中”。

方老师于1978年8月间在风雨飘摇的年代中离开了我们，作为他门下的许多学子的我们都有去烧香吊拜。

反刍输乳几经秋，
劳瘁宁为孺子牛。
傲骨在春風化雨被南洲。

蔡剑声校友手抄于2007年，雅加达。



70年代据於雅加达。



忆方步樵老师

陈浩凯

振强学校成立已百年，这么高龄的华校，在海外华校中恐怕是屈指可数的，值得为她骄傲。我是1950年初中第三届毕业生，对母校的悠久历史一无所知，深感愧疚。由于政治上的原因，振强学校1966年被勒令停办，连学校校舍也荡然无存，然而在我脑海里仍然留下依稀的影子。

记得我们初三毕业班的教室可容纳三十多位同学，这些英姿勃勃的青年学子，怀着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时期辍学后强烈的求知欲望，一个个如饥似渴，专心致志地听老师讲课。一间不到10平方米的图书室，少得可怜的图书成了师生们课余宝贵的精神食粮，每天下午都挤满了来借图书的学生。礼堂是全校集会的场所，每星期一的周会成了例行仪式和对全校学生进行思想教育的重要方式。

振强提倡德智体美全面教育，既教书又育人，鼓励学生独立思考，关心祖国命运前途。学生思想比较活跃上进，如有的学生喜欢写作，写点小文章、诗歌投往报社发表，各班都有自己的版报园地。虽然学校的条件并不完善，辅导教师不足，但同学们根据不同爱好想方设法开展各项文体活动。篮球运动是同学们最喜欢的项目，还有羽毛球、游泳等。高年级虽然没有美术、音乐课，但课余爱好者不少。我从小喜欢画画书法，在全市学生书法比赛曾获第一名，还专为图书室画了两幅伟人像——毛泽东和鲁迅。振强特别重视师资的质量，从某种意义上说，师资质量决定了学生的质量。

就在最后的学年，来了一位方步樵老师，被聘为教务主任兼国文老师。他身材高昂，瘦骨嶙峋，双目炯炯有神，给我第一印象是他很有学问、气质非凡，令人敬重。一听他的课，我更喜欢他了。记得方老师讲解鲁迅的《药》时，深入浅出，引人入胜，从文章结构到整体构思，到文章的思想性和社会意义，分析清晰透彻，真是令人茅塞顿开，感悟良多，获益匪浅。

有一次，方步樵老师生病了，我们几个同学去看望，只见他躺在床上，见我们来了，强打精神，招呼我们坐在床前，兴奋地同我们交谈起来。从八年抗战谈到解放战争，谈到全国解放前夕的时局。我问土地改革是怎么回事？他停顿了一下，问我们：什么叫阶级？什么叫阶级斗争？什么叫革命？当时我们听到这些名词，有些陌生，究竟是什么意思，答不出来。方老师看我们面面相觑，便结合土改运动详尽分析回答了我们的问题，然后话锋一转，他说：国内有很多进步青年学生毅然投笔从戎，奔赴延安，走向抗日和解放战争的战场。你们在侨居地能有书读，就要好好学习，将来要为新中国做些贡献。方老师语重心长的一席话，强烈地激荡着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

这时，有位同学向方老师提出想创办一个油印刊物《艺学》，方老师听了非常支持，并愉快地答应担任指导老师和题写刊名《艺学》，由编辑部组织稿件，由我抄刻腊纸出版。后来《艺学》又改为铅印出版，方老师为我们题词：“吾不如老农，吾不如老圃”，借孔子的名言，勉励我们要虚心学习，要实事求是、踏踏实实地工作。

这一次难忘的启蒙教育深深地扎根在我的心底里，可以说，它为我以后的人生道路的抉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从那以后，我们毕业班思想更加活跃，经常谈论的话题是祖国的形势如何，很自然，《黎明报》成了我们必读的报纸，有些同学还写些时评和歌颂新中国的诗歌，向《黎明报》投稿；同学间传阅由香港搞来的中文书刊和文学作品书籍。

1950年，我们初中毕业了。一部分同学光荣踏上回国的征途。后来传来信息，他们中有的参军参干，奔向抗美援朝第一线。我们没有机会回国的同学，想继续上高中只有到雅加达。我不愿经商，决心不靠家庭，到雅加达半工半读，很幸运考上巴城中学继续上学，高一读完，适逢回国升学建设新中国热潮在学生中掀起。1951年7月1日我同巴中、华中一千多同学登上“芝渣连加”巨轮奔向日夜思念的伟大祖国。到了广州，我同一部分同学继续北上到了首都北京，考上育英中学插班高二。两年高中学习期间，荣获“品学兼优”称号，高中毕业考上清华大学建筑系，大学毕业留校工作至今。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现在过着退休后的晚年生活，但我并没闲着。我用学生时代业余学到的合唱指挥知识为老年教师、为归侨业余合唱团服务，也算是发挥自己的余热吧。

每当回想自己走过的革命道路，实现了参与建设伟大祖国的梦想，就会想起敬爱的方步樵老师，是他给我指引前进的方向。他是我最敬爱的启蒙老师，我永远怀念他。



我的堂伯游文华老师

游惜贞

我的堂伯游文华老师是一位热爱教育、两袖清风的好校长，献身华教事业25年，吃的是粗茶淡饭，住的是低矮的木板屋，他为振强教育倾注了毕生心血，令学生们终生纪念着他。

我的祖父是游老师最小的叔父，游老师比我父亲大，是我堂伯。他衣着很简单，白色的长袖衣，袖口卷到半臂，还有那件淡黄色的黄仁裤，裤袋里装着一大把钥匙，长年累月就是这么样的装束，几乎成了他的标志。

游老师瘦削的脸庞，高耸的鼻子，炯炯有神的眼睛，不高的身材，头发梳得整整齐齐。

在学校里，游老师是一位好校长。他完全没有架子，不论贫富的学生，一样看待，他不多说话，平时总是默默无语地坐着，当他上课时，就滔滔不绝地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总在设法使学生永远走在正道上。

在家里，他是一位好丈夫、好爸爸。自己能做的工作，从不麻烦太太，每到春节，他会为小女儿梳头，打蝴蝶结。

游老师也十分擅长画虎，他的画平时珍藏着，春节才把它挂在客厅墙壁上，琳琅满目，令来客看了啧啧称奇。我不懂艺术，只觉得他的画似乎有一种魅力，深深地吸引着我的视线。

61年底我初中毕业，当时高中实行下半年制，所以年底毕业的初中生，得停学半年才能上高中。停半年学，我怕影响以后的学习，彷徨、无奈，我怀着极度不高兴的心情，领到成绩单，也没心思打开来看。李老师说发成绩单，他说校方允许成绩好的同学插班，凡是每科及格，而总平均在七十五分以上就有资格插班，班上有八位同学入选，我心里一动，马上打开成绩单检查，顿时令我欢喜若狂。随后李老师又讲了插班手续与事项，我太高兴了，竟没有听进去。

我来到教务处，询问老师要不要照片，游老师站在旁边，笑着说：“要！要一张放大二十寸的！”我听了如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伯，你的表格一张才多大？要这样大的照片做什么？”伯伯哈哈笑，指着教务处正门的墙壁调侃道：“你把放大的照片拿给我，我替你放在镜框里挂在那里，整个学校的同学就能认识你了。”原来他是跟我开玩笑，我和李老师相视而笑，然后李老师才说，照片在学校里还有存底，能省则省，不必再去冲洗了。

假日，我喜欢去游老师家玩。他的家靠近卡江，屋前是铁厂，左右邻居鳞次栉比，太阳光照射不进，只靠屋顶的玻璃天窗透进微弱的亮光。一踏进这老木板屋，你会感到这是一位清苦教师的住家，客厅里除了简单的木凳、桌子以外，什么也没有。一个家被伯母收拾得井井有条，天天擦的地板，一尘不染，虽然简陋，却给人一种温暖、舒服的感觉。

高中毕业我响应学校的号召，去乡下教书。爸爸认为女孩儿家不宜出远门到偏僻的乡下，就去跟游老师商量，伯伯通过爸爸告诉我，母校也缺乏老师，不如留在母校任教。可是我已报名到乡下，而且不希望有裙带关系的误会，谢绝了游老师的好意。我去意已定，爸爸也无奈我何，叫我直接去见游老师，伯伯也不勉强挽留，只语重心长地告诉我女儿家处世准则：要保持朴素、大方，出门的人，手脚要勤快，勤快的人去到哪里，人家都喜欢。更重要的是要慎重交友，女孩子一失足就遗终生，一定要洁身自爱。为了特别提醒我，他在我的毕业纪念册上题写了：“亲忠厚、而远油滑。”那时他已生病了，好多天没有去学校，身体很虚弱，可是还抱病为我题字。

有一天我去看他，他从房里一步一步踱出来，慢慢地坐在椅子上，一语不发。我向伯伯望去，他瘦了很多，本来瘦小的身躯，现在更显得瘦骨嶙峋，瘦削的面颊上，衬托着一双茫然无神的眼睛，看得出他十分困倦。那时我太年轻，不懂得人情世故，只机械地问了一问，“伯伯，你觉得怎么样？”他摇了摇头，微微叹了一口气，默默无语。我也想不出要说什么话，静静地呆坐着。我怕他太困乏，就告辞走了，想不到这是我最后一次和他见面。

1964年3月27日，那天刚好是假日，我坐在窗口下温习功课，爸爸有异寻常，九点多就回来了，一进门就告诉我一个坏消息：“你伯伯去世了。”说完去换衣服，又匆匆走了。

我再也不能集中精神温习，告诉妈妈一声，沿卡江边向伯伯家走去，客厅里全是老师和同学，我径直走向厨房，那里挤满了亲戚朋友，伯母一边流泪，一边诉说伯伯的病况。想到他平时对我的关心，现在他去世了，再也不能见到他，想到伤心处，悲从中来，泪如雨下，欲止不能。

29日出殡那天，前来送葬的亲戚朋友、老师、同学人数之多，实属罕见，人山人海。灵堂上庄严、肃穆，灵前设一香炉，缕缕轻烟，散发出阵阵幽香。

人必定会死，可是游老师才五十出头，正是大展雄才的时候，可惜天不假年，英魂归西，这是华教事业的重大损失。

美术家的教务主任 ~ 李昆峰先生

李雷骅 ~ 资料 许志 ~ 编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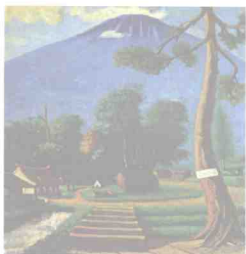
李昆峰先生

李昆峰先生(1905年—1986年)字永高,福建厦门人,出生于井里汶,后随父亲迁居垄川,16岁回国于厦门美术专门学校深造,专修肖像画。

昆峰先生美术造诣很深。早期作品多为炭画,后期自修水彩画、油画作品,也有许多其他的作品。

昆峰先生喜欢写生,有不少坤甸文物古迹的写生画作品。

昆峰先生特别擅长肖像画,作品中人物眼神炯炯有光。1950年坤甸华侨庆祝新中国第一届国庆大游行时,最前列的2米高毛泽东主席油画像就是李昆峰先生所作。



昆峰先生战前曾在垄川教书。1938年迁居坤甸在福东任职。时任福东总经理的李师深(乃德,伟民校友之父)是昆峰的堂弟。李师深先生为日寇所害,战后福东改组,三发分行关闭,昆峰离职。

郭武坚校长遂邀请昆峰先生出任一校(振强小学)教务主任,兼教美术、历史和印尼文。有人说一位大画家教小学美术课,未免“大才小用”。但李先生不为所动,始终以教学为乐,长期在教育界工作,李先生为人沉默寡言,任劳任怨,以微薄的收入,支撑家庭,把七个子女培养成对社会、国家做出诸多贡献的“有用的人”



上述昆峰先生遗作,保存者:李雷骅,那光社摄



忆廖文仲老师

黄新聪

廖文仲老师在振强中学任职的时间很短，只有一个学期，但他是我终生难忘的一位老师。

廖文仲老师原籍广东揭阳，1924年12月25日生于揭阳县半洋村，1939年家乡沦陷后随父来印尼山口洋。1941年春，文仲老师和一批爱国青年，满怀抗日救国的激情，冲破重重阻挠和困难，经新加坡辗转缅甸腊戍等地，历经磨难，回到了祖国抗日战争的大后方云南省。先在云南保山县华侨中学、贡贡县华侨中学读书，后相继在昆明西南中山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和北平北京大学深造，1948年夏毕业于国立北京大学文学院中文系。1949年1月，文仲老师重返山口洋，任南华中学教务主任兼语文教师；1949年下半年应聘来《黎明报》工作，主编《黎明报》的副刊；振强中学复办后，兼任振强中学语文老师。



廖文仲老师1948年7月毕业于北京大学文学院中文系，图为当年由胡适校长签名的毕业证书。

我认识文仲老师，是在1949年的暑假。当时，我们班去山口洋旅行，住在南华中学校舍里。当晚，南华中学学生会为我们举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联欢会。会上，曾祥鹏校长带头唱歌，唱的是抗日战争后期流行于大后方的民间歌曲——《茶馆小调》，当他唱到最后一句“把那些压迫我们、剥削我们，不让我们自由讲话的混蛋，从根剷掉！”时，会场上掀起了一阵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接着啦啦队以整齐划一、有节奏的掌声，高声呼喊着：“廖老师，来一个！廖老师，来一个！”几分钟后，仍未见有人登台，啦啦队劲头更足，口号升级了：“廖老师，别扭扭捏捏！廖老师，别扭扭捏捏！快上台！快上台！”大有你不登台演唱，我辈学生绝不罢休之势。这时只见一位身材魁梧，英俊潇洒，两眼炯炯有神的学生站起来，他神态亲和，略带腼腆地对大伙说：“我不会唱歌，又没有其他表演才能，我给大家朗诵一首诗吧！”这时，欢腾喧哗的会场，骤然鸦雀无声，一片宁静，学生们聚精会神地聆听他的诗朗诵。廖老师朗诵的是近日写的一首新诗，题目好像是《迎接新中国的诞生》。他有时心境平静，轻声细语，声调优美；有时心潮澎湃，昂首挺胸，慷慨激昂。当他朗诵到最后一句：“让我们伸开双臂，拥抱新生的祖国——新中国”时，还很有表情地作了一个双臂伸开的拥抱动作。顿时，又是一片热烈的掌声。联欢会自始至终洋溢着师生平等、团结、友爱、爱善的浓烈气氛，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回校后，我写了一篇通讯《南中素描》，刊登在我们班出版的《学艺》半月月上。

文仲老师是一位很有才华的文学青年，早在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读书的时候，他就热爱诗歌，参加进步学生组织的“新诗社”。文仲老师的导师是中国现代文学大师、长诗《阿诗玛》作者李广田教授；同窗友好有后来蜚声国内文坛的著名诗人、作家李瑛。文仲老师重返印尼后，同李广田教授、李瑛等人仍鸿雁不断，可见他们友谊之深，也说明李广田教授对文仲老师的赏识和关爱。文仲老师来《黎明报》工作之前，就曾为《黎明报》的副刊写了不少新诗和散文。当年，我很爱读他的诗。文仲老师的诗想象丰富、感情充沛，既有内心的感触，又有哲理的思考，他的诗韵律优美，节奏性强，可惜因年代久远，他当年发表在《黎明报》的诗作已无法找到。我只依稀记得他当时常用的笔名有“绿南”、“未名”等。

文仲老师到《黎明报》工作后，我们见面的机会多了。当时，我在《黎明报》半工读——利用课余时间到《黎明报》抄写广播新闻。报社就在学校附近，我每天几乎要去报社几次，有时是去送电讯新闻稿，有时是去聊天。我同文仲老师接触的机会多了。他工作很认真，我每次到报社，只见他埋头伏案，少言寡语；有时，他看到我来了，抬头望了一眼，面带笑容地说了声：“新聪，来啦！”之后，又继续工作，或写文章或编辑。有时，我看到他的桌面上摆着新到的外报报纸杂志，如香港的《文艺生活》、新加坡的《南侨日报》、雅加达的《生活报》或一些文艺新书，当我走到他跟前时，他很善解人意地说：“你喜欢那些报纸和新书，就拿去看吧！”态度是那样和蔼、亲善；有时我送一些习作给他修改，他也只是示意我放下，说道：“让我拿回家，慢慢看吧！”之后，又继续编辑。在办公室，他是很少和人闲聊的。和文仲先生接触多了，对他便多了几分了解，他平时虽然语言不多，但对人，特别是对学生是那样的慈祥和蔼、友爱和热情。有一次，我到他的住处去，他拿起我前几天送给他的诗，很认真地给我修改了几处，他一边修改，一边批注，然后很诚恳、谦虚地说：“新聪，你看这次改动是不是比原来的好些！”他循循善诱地指导我写诗、写短篇小说。我当时喜欢马雅可夫斯基和马凡陀的节奏性很强的诗，也喜欢模仿他们的诗句。他很不以